

一、幕末开国与天皇重返政治舞台

- 危机四伏的幕藩体制
- 幕府无奈签约开国
- 幕末政争中的孝明天皇
- 病死？还是毒杀？

1853年7月8日下午5时四艘黑色的大船全副武装地驶入了日本德川幕府的咽喉要地——江户湾的浦贺港（今横须贺市的一部分）来船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的一支舰队，由两艘蒸汽动力军舰和两艘武装帆船组成，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是当时美国海军中最精锐的蒸汽动力舰。它们的到来，犹如静水投石，在闭关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激起了轩然大波。

警卫海岸的德川幕府官兵被突然逼近的黑色巨舰吓得目瞪口呆，一边紧张地注视着浓烟滚滚、炮口骇人的庞然怪物，一边派人向浦贺奉行所（幕府设立的对所有驶入江户湾的船只进行检查的官方机构）报告。心颤魂飞的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先后派出与力下级警官中岛三郎助和香山荣左卫门冒充“浦贺副总督”和“浦贺总督”两次登上美舰，窥测虚实，了解其来意。培里一面指派副官谦梯和参谋官亚当士先后出面交涉，要求日方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并确定接受国书的场所；一面令舰队派人探测江户湾沿岸水深，意在摸清航道，向幕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面对来势不善的美国舰队，德川幕府更是焦虑不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早已使幕府清醒地认识到了“黑船”的威力，海防薄弱且毫无准备的现状使幕府别无选择，作为“一时权宜之策略”只好同意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滨（横须贺市）举行接受美国国书的仪式，以求尽速“和平解决，使其返航”。

7月14日是双方商定的递交国书的日期。这一天，培里率300余名美国官兵在久里滨登陆，成为锁国以来首次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批外国军人。在久里滨迎候培里的是冒称“帝国首席顾问官”的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和井户弘道，另外还有先前曾登舰交涉过的与力中岛、香山及荷兰语翻译崛达之助等人。在临时搭起的一座围帐内，双方在肃穆的气氛中举行了短暂的国书交接仪式。美国总统在国书中提出了3项要求，即日本解除锁国政策，双方“友好建交”，缔结通商条约，但表示若碍于锁国旧章不能应允时，

则可以 5 年或 10 年为限进行试验，若双方贸易无利可图，则可重新恢复旧章。向途经日本港口的美国船只提供煤炭和粮食，保护遇难船员。

为了使日本俯首贴耳就范，培里还向户田递交了一封以私人名义致德川幕府的亲笔信，以强硬的态度谴责幕府过去的政策是把外国人当作“最坏的敌人”和“仇人”来对待，要求日本接受美国的 3 项要求，并将于第二年春天再次来航，听取答复。还威胁说：“如有需要，则打算率领更强大的舰队再来江户。”面对培里的恫吓，户田等人唯唯诺诺，只剩下恳请培里舰队尽速驶离日本而已。

美舰略展威力，便使德川幕府接受了美国国书。培里率舰来日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之美舰所带粮食、淡水不多，并急需前往中国执行任务，在约定了明年再来听取答复后，培里率舰队扬帆而去。

培里舰队远去了，却给德川幕府留下了令其头痛的难题。是恪守祖法、继续锁国，还是接受美国的要求，转而开国？在两种选择面前，德川幕府茫然不知所措，被迫改变了历来不许朝廷和臣民干预朝政的老章法，一面请示天皇朝廷，一面下令全国诸侯、官吏以至平民都可自由上书，献计献策，以作出决断。幕府在外压下采取的这一无奈之举，不但给以实力为后盾的强藩过问幕政开了先例，更为长期被剥夺实权的天皇朝廷重返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一时间，各派政治力量以“开国”为契机，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日本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天皇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①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这首当时日本流行的类似讽刺诗的“狂歌”，形象地描绘出了“黑船”对日本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①“上喜选”是日本的名茶，恰好与“蒸汽船”谐音；“只消喝四碗”暗喻“只来四条船”。

危机四伏的幕藩体制

“黑船事件”为何会对日本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这需要从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说起。

当时日本实行的仍是“武家政治”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德川幕府是继镰仓幕府(1192~1333年)、室町幕府(1392~1573年)之后,于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的统治体制是一种由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相结合的“幕藩体制”。

德川幕府的最高首领称“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政厅叫“幕府”,设在江户(今东京)是全国的最高政权机关。控制着全国的内政外交大权,掌握着约80万人的嫡系武装。幕府的主要官员是:辅佐将军掌管全国政务的“大老”(非常设,1人)、老中“和”若年寄(各4人)等。幕府将军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主宰者,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他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也叫“天领”),年收入约合稻米700万石(1日石约合180.5公斤),并掌握着全国最大的3个城市江户、京都、大阪(也叫“三都”)和唯一的对外贸易中心长崎,控制着全国的商业。他还拥有佐贺金矿、生野银矿和阿仁铜矿等矿山,从而垄断了金银铜三货的铸币权。这一切就构成了幕府将军集权统治的基础。

将军把自己直辖领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给260多个大名(诸侯),大名的领地称作“藩”(亦称“藩国”)因之大名又称为“藩主”。藩主的领地大小不一,政治地位也很悬殊。大名按照同将军的亲疏关系可分成三类: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亲藩

大名“为德川家康的子孙其中尾张、纪伊、小户 3 藩称‘御三家’，一桥、田安、清水了藩称‘御三卿’，皆享有出任将军的特权”；谱代大名“为 1600 年的‘关原之战’^①前即追随家康的亲信武将，其领地分布在‘天领’周围和险要之地，拱卫将军、幕府的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要职由谱代大名垄断”；“外样大名”则是关原之战后被迫臣服于家康的大名，其领地多为远离江户的僻野之乡无权过问幕政，且受到幕府的严密控制和防范。为防止外样大名反叛，德川幕府实行“参勤交代”制度，规定大名必须隔年定居江户，其家属则须留在江户作为人质。

作为地方封建领主，大名具有两重性。其一，他们是幕府统一政权的地方政权，因而要服从幕府的统治及其所颁布的各项法令。其二，大名又是世袭的封建领主，所在藩的主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经济上，他们有权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封建年贡，把持本藩土特产品的专卖，发行藩内货币“藩札”，享有经济自主权。政治上，设有独立的藩政机构，置家老、中老、奉行、目付等官职，任免权由大名自行决定，将军不予过问；军事上拥有自己的家臣武士团。另外，各大名在藩内还拥有独立的立法、司法权。这样，各大名在藩内可称得上是专制独裁的“君主”。

这种由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相结合的畸形政体，造成了幕府统治的脆弱性。在幕府实力强大、强本（将军）弱末（大名）方针奏效时，相互制衡，使德川幕府基本上保持了二百余年的安定局面。然而，当幕府衰落、雄藩崛起，两极均衡的结构遭到破坏时，幕府的统治便难以维持。

事实也正是如此。幕府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幕府的财政日形见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幕府的统治力日趋削弱。而一直与幕府貌合神离的外样大名，尤其是雄踞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

^① 德川家康与丰臣秀赖争夺天下之战。通过此战，德川家康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霸权地位，于 1603 年在江户建立了德川幕府。

佐、肥前四个藩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和保护工商业“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增，成了足以与幕府分庭抗礼的强藩。产生了改革幕府统治，问鼎中央政权的要求。这西南四藩成为未来革新力量的大本营和倒幕运动的发源地。

德川幕府的集权统治除受到地方分权势力的制约外，还面临着来自于天皇朝廷的潜在威胁。自 12 世纪末叶武家政权确立以来，天皇便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德川幕府颁布《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7 条，规定天皇不得过问政治，只能读书、吟诗作画，专注学问。天皇的领地也只有 3 万石，加上其它皇族和公卿的领地也不过 12~13 万石，远不及一个大诸侯。另外幕府还在天皇的所在地京都派驻官员，严密监视着天皇朝廷的一举一动，以致于被称之为“京都的囚徒”。但是，由于天皇被认为是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具有超人的身分，被称之为“现人神”。因而他在德川时代仍不失为整个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在将军的继任形式上还要由天皇来任命。不满于大权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虽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势力，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一政治势力为自己的夺权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天皇的名义来动员和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日本的革新势力正是利用天皇的权威来反对将军，进行倒幕运动的。

德川幕府为维护其封建的集权统治，对内还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把全体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即武士，是高踞四民之首的统治阶级；“农”即农民；“工”即手工业者；“商”即商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负担着全部的赋税，是居于社会下层的被统治阶级。不同等级之间绝对不许通婚，职业、服装和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限制，不得违制逾越。但到了 19 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

化 封建的等级制日趋瓦解。

首先 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逐步解体 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富农 (豪农 和贫民 水吞)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 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没有一点土地 他们只能作为世袭租佃者 按“永久租佃权”) 耕种领主的一小块土地, 向领主缴纳 50~70% 的实物贡租 (年贡米)。领主为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 剥夺了他们的许多自由 不许分家分地、迁徙和转业 不许自由种植作物 更不许转让和买卖耕地。但是 自 18 世纪中叶以后 由于商业资本渗入农村 严禁土地买卖的禁令被冲破。一些富裕的农民和商业高利贷者, 通过放债的形式 将农民抵押过期的土地据为己有 或招募农民开垦新田 占有了大量土地 成为新兴地主 被称之为“豪农”) 到 19 世纪中叶, 这种新兴地主已拥有全国耕地面积的 1/3。他们有的雇工耕种 但多数仍租佃给农民 收取地租 同时还兼营工商业 放高利贷 成为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他们要求发展经济 否定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这个阶级后来和一部分下级武士结成联盟, 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重要力量。在新兴地主出现的同时 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新地主的佃农“水吞”) 他们不仅依旧要向原封建领主缴纳年贡, 而且要向新地主缴纳佃租, 生活状况日趋恶化。受到封建领主和新兴地主双重剥削的贫苦农民, 在幕府末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暴动。据统计, 仅 1801~1867 年就发生 1169 次 平均每年达 17 次之多。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和市民骚动相呼应 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是日本得以推翻幕府, 实现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

其次 商业资本渗入农村 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 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自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 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 农村家庭手工业得到发展, 一些商人乘 通过提供原料或生产工具、廉价收购产品的方式 控制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有的商人还直接投资开办手工工场 招募农家子女 集

中在一起进行生产。这样，就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和集中的手工工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权，其经济活动又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因而具有反封建的要求。但由于幕末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发展还不充分，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期阶段，还没有能力领导未来的革命。

再次 随着城市大商业高利贷者财富的日益膨胀 其社会地位日见增长，成了左右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德川幕府对商人本来十分轻视，把他们置于封建等级的下层。为防止封建经济瓦解 幕府令商人组织封建行会“株仲間”实行严格监督 甚至对商人的服饰、穿着都有法令条例加以限定。但是 由于日本的统治阶级 几乎所有成员——将军、大名、武士都毫不例外地过着城市寄生生活。他们必须出售农民缴纳的年贡米，换取货币以维持城市消费。严格的等级身分制又使他们耻于经商，于是幕藩领主便把保管、出售年贡物质的业务，委托大阪或江户的富商和高利贷者，从而使领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形成了强烈的相互信赖关系。特别是到了幕府末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以“三都”（江户、大阪、京都）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这些商业高利贷者已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出现了像三井、鸿池、住友、小野、岛田等少数富甲天下的特权大商人。雄厚的经济力量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拥有强大势力。幕府末期的将军和大名因挥霍无度，财政拮据，不得不向富商低头借债。有些大名因负债累累而被富商挟制，不得不让他们购买武士头衔 甚至准许他们参与藩政 以致出现了“幕藩疲弊 权落商人”¹⁰¹；大阪富商一怒 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商人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封建等级秩序。这些特权商人在经济上受到封建所有制的束缚 在政治上受到等级身分的压制 因而同封建主有矛盾。但是 他们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依赖于封建主 他们的商业特权来自于封建主，因而同封建主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虽缺少革命的要求，但并不拒绝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变革。在未

来的倒幕运动中 最初虽曾持动摇、观望的态度 但最终还是投向了倒幕阵营。

还有下级武士的资产阶级化，彻底动摇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幕藩体制的基础。当时日本存在着约 40 万人的下级武士，他们是将军或大名的家臣 是世袭的职业军人 拥有佩刀等特权 负有跟随主人作战的义务。靠从主人那里领取固定的“禄米”而生活。但到幕府末期 由于幕藩领主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 他们的禄米往往被削减或停发 其生活每况愈下 不得不依靠典当和借贷过日子。许多人被迫另谋生路 有的舍弃士籍 设塾教书或开业行医 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 更多的去从事他们过去所鄙视的商业和手工业 有的人甚至去当商人的养子或与商人的子女结亲。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在经济利益上同资产阶级日趋一致 成为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经济地位的变化决定了他们政治立场的转变，从封建统治的支柱变成了反封建的革新力量。特别是他们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 从广泛传播的西学 从德川幕府中期起通过荷兰书籍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又称之为“兰学”中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 逐步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 产生了学习西方、变革现状的维新要求 成为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成功地领导了未来的倒幕维新运动。

这样 到幕府末期 随着新兴地主、工场手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崛起、下级武士的资产阶级化等一系列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封建的等级制度已分崩离析，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

为维护幕藩体制下的封建统治秩序，德川幕府对外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 1633~1639 年间，幕府连续发布了 5 次“锁国令”宣布加强贸易统制和沿海警备 严禁日本船只出海贸易和与外国人往来 取缔基督教 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等 建立起了一个严

密的锁国体制。除与中国和荷兰在长崎一地维持着有限的贸易外，完全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

持续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使日本经济同世界市场隔绝，严重影响了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它堵塞了日本人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途径，造成了日本社会的落后状态，使日本日益潜伏着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

早在 19 世纪初，欧美许多国家就曾先后派使节到达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只是由于当时西方列强或实力不足或忙于各自的战争，德川幕府尚能搪塞拒绝于一时。但是，到 19 世纪中叶，随着列强加紧向东亚侵略扩张，特别是当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之后，列强的侵略矛头指向了日本，摇摇欲坠的德川幕府再也无力抗拒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了。所以，当培里舰队敲响了中国闭锁的大门，更为强大的冲击波向日本再次袭来时，幕府统治的丧钟也随之敲响了。

幕府无奈签约开国

培里舰队离日后，德川幕府为征询对策而忙乱不休。

7 月 15 日，首先派特使赴京都，将培里来日要求开国的经过上奏天皇朝廷。

7 月 28 日，令幕臣们就如何对付培里舰队再次来访的问题进行讨论。

8 月 5 日，又将译成日语的美国总统的国书和培里的私人信函分发给各藩大名传阅，并让其就如何答复美国的要求发表意见。

时隔不久，各方面关于对策的意见纷纷反馈回来，说长道短，莫衷一是。

天皇及大部分公卿都主张攘斥夷狄，维护国体。由于天皇朝廷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无权参与国事，加之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使得天皇及朝廷公卿大臣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知之甚少，对于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扩张十分恐惧。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堂堂的大清帝国已败在英、法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之下，深恐日本重蹈中国的覆辙，担心自己会为此丧失特权地位而成为俎上肉、阶下囚。所以，当临朝听政的孝明天皇 1846~1867 年在位 闻知“黑船事件”后 匆忙前往寺院神社，一连祈祷了 17 天 祈求神灵保佑，“迅速攘除夷类 切莫殃及国体”。在他的影响下 朝廷日益成为鼓动攘夷论的大本营。

各藩大名的意见则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拒绝论、开国论两大类。但也有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仅表态以幕府的决定是从。

持拒绝论者占绝大多数。但又可分为主战和避战两种。“主战的拒绝论”的代表是越前藩主松平庆永。他认为，与其屈服于外压开国，导致动乱而自招败亡，不如将军出马亲征，以武力驱逐外夷。“避战的拒绝论的代表是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他认为，在日本海防薄弱，武力驱逐外夷没有把握获胜的情况，应当对美国施展拖延开国日期的策略 以三年为期 乘机加强海岸防守 巩固海防。

在主张开国的大名中 也可分为“有条件的开国”和“积极的开国”两种意见。筑前藩主黑田长溥主张采取“以夷制夷”策略 即限定时间，在五、六年内允许美、俄两国也像荷兰那样在长崎的出岛设立商馆 进行贸易 靠结好美、俄、荷三国 以抵制英、法等国的通商要求 使日本处于主动地位。持“积极的开国”论者为数极少 他们强烈要求幕府解除建造大型船舶的禁令，将建造出来的大型船舶用于军舰和商船，在加强军备的同时答应美国的要求，打开国门与外国通商，日本的大型商船也要出海远航。

幕臣们也上陈了许多意见，大抵与藩主们的意见相同，不外攘夷、开国两种意见。

面对来自大名和幕臣们的各种意见，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等人难以作出明确的决断，只得决定再次采取“挂起来”的推延战术。12月1日，幕府宣布了对培里再次来航应采取的政策，表示由于边防未固，不能妄启战端，美使再来，决定不作明确答复，尽量妥善处理，使其回国，同时作好万一准备。

培里本来约定“明春”再来，但由于在他离日一个月后，俄国也派海军中将普提亚廷率领四艘军舰驶入长崎，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并划定日俄北方国界，这使培里深感不安。为防止俄国抢先，培里不顾严寒，提前从香港出发了。

1854年2月13日，培里率舰队再次出现在江户湾，停泊在横滨的小柴冲。其舰队由“波瓦坦”号旗舰、“萨斯奎汉那”号、“密西西比”号3艘蒸汽动力舰及2艘武装帆船、2艘运输船组成。与上次相比，新增加的2182吨的旗舰“波瓦坦”号，使舰队的威力显著增强。随后，又有1艘武装帆船和运输船于3月先后赶来会合，更增添了舰队的实力。9艘坚固庞大的舰船首尾衔接，排成了炮口齐指海岸的战斗队形。

培里舰队的再次到来，令幕府再度陷入恐慌之中。老中们接连发布一道道命令，禁止庶民驾舟参观“黑船”，以防不测，责成江户湾沿岸官员要确保江户城的粮食等物资供应，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2月22日，新上任的浦贺奉行所“组头”（警卫队长）黑川嘉兵卫奉命登上美旗舰“波瓦坦”号，与舰长亚当斯开始交涉，确定接待地点问题。美方坚持接待地点应设在离江户较远的地方，否则就把舰队径直开进江户，日方则希望在距江户较远的浦贺、久里滨或镰仓。交涉一度陷入僵局，幕府想借此拖延谈判。在3月5日第3次交涉时，培里再次使用恫吓战术，声称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

缔约的要求，美日双方将兵戎相见。美方在近海有 50 多艘军舰集结待命，在加利福尼亚还有 50 艘军舰整装待发用 20 天的时间即可到达日本。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海军尚未拥有 100 艘军舰 培里是在漫天撒谎、虚张声势、迫于美方的军事压力 日方只得同意在江户附近的横滨 神奈川 设立接待处 并在此举行正式的缔约谈判。

3 月 8 日 培里舰队到达横滨。临近中午时分 培里率 446 名官兵在横滨登陆，随即带领美方谈判人员步入临时搭成的接待厅。在这里 幕府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大学头’（江户时代学向所的长官 负责培养官吏 由儒家林氏世袭 林复斋及江户町奉行井户觉弘、浦贺町奉行伊泽政义等‘美利坚应接挂’（即全权代表 早已守候多时。双方叙礼寒暄毕，停泊在横滨海岸的美国舰队接连鸣炮 48 响。隆隆的炮声回荡在天海之间，大有震耳欲聋之势。这是培里刻意为谈判准备的一手把戏：名义上为庆贺美军登陆及谈判开始，实则向日方炫耀武力。随后，日方接待人员送上日本名酒佳肴 盛宴款待美方人员。丰盛的午餐刚刚结束 培里便向林复斋递交了一封用汉文写成的催促幕府缔约的美国总统信函，接着又拿出了一份中美《望厦条约》的汉文副件和以该条约为蓝本的日美条约草案。其用意十分清楚 幕府应当以《望厦条约》为样板 缔结日美条约。

幕府老中与谈判代表们在一周的时间内，对美方的条约草案字斟句酌地进行了研究 并将美方提出的草案与同时拿到的《望厦条约》相互比较 努力寻找相异和相关之处 以便制定日方的条约草案。到 3 月 15 日 在培里的一再催促下 日方谈判代表才将用汉字写成的包括 7 条内容的条约草案送交培里。该草案仅同意在长崎一地 向途径日本的美国船只提供所需的物质和移交遇难海员 并规定美国人不得随意在长崎登陆 关于开放港口的问题 须待 5 年之后才能考虑。而对于美方提出的通商和缔结‘友好’条约

问题则只字未提。

幕府的草案使培里大为不满，他表示，通商问题可以不强行要求，但让美国同荷兰一样仅在长崎一地进行有限的活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为迫使日方就范，培里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他一方面不断给日方写信，强调仅仅救护遇难船员或提供物质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必须开放长崎以外的港口并立即与美国订立条约。另一方面，则怂恿荷枪实弹的美军官兵任意在横滨海岸登陆，恣意闯入民家、商店，强行索取所需物品，并命令停泊在海面上的黑船舰队进入战备状态，飘游不定，时隐时现，令幕府警备部队的神经紧张不安。

另外，培里还利用外交礼仪向日本尽情展示美国的物质文明，进行威慑外交。3月13日，培里向日本不仅赠送了55件先进的农具和48种优良的蔬菜种子，而且还赠送了140件美国最先进的工业制品，如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等。其中，赠送给日本的那台小型蒸汽机车，大小和一匹小毛驴相当，能在18英寸的轨道上奔跑，时速约30英里。培里让随行的5名技术人员专门在横滨铺成圆周型的路轨，点火开动。面对汽笛呜呜、车轮飞滚的蒸汽机车，围观的幕府官员看得目瞪口呆。而那门从“萨拉托加”号军舰上拆下来，作为特别礼物赠送给日本的大炮，更令幕府官员们惊叹不已。作为礼尚往来，日本回赠的礼物不过是大米、白酒、纸扇、漆器等农产品和传统手工制品。为弥补物资上的相形见绌，幕府特选派了50名膀大腰圆、粗壮如牛的相扑运动员去搬运回赠的大米，目的是向美国人展示日本相扑惊人的力量。每个相扑一次能搬运4袋计240公斤大米的表演，虽赢得了美国官兵的惊叹，但毕竟是难敌枪炮子弹的蛮勇竞技。

3月27日，培里还特意邀请日方代表登舰参观。届时除鸣放礼炮外，还让美国士兵进行了使用大炮、步枪的实战演习，登陆的模拟战和消防演习，令日本官员亲眼目睹了美国军事装备的威力。

参观结束后 又在甲板上举行了丰盛的午宴 让双方代表交欢于美酒和舞乐之中，借此笼络日方代表的感情，力图营造出美日双方“融洽”“和谐”的假象。

培里威迫利诱的外交策略果然奏效，日方最终满足了他的要求。1854年3月31日 双方代表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修好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今静冈县伊豆米岛东南端）箱馆（今北海道函馆）两处港口 准许美国舰船在两港口加煤上水 并得到粮食和其它所需物资的供应 日本有义务救护遭遇海难的美国船只及人员 美国可在下田设立领事馆 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适用于美国，即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等等。

《神奈川条约》签订后 培里又率舰队先后视察了下田和箱馆，并于6月20日在下田同日方代表又签署了《神奈川条约》的附属条约《下田条约》 规定了《下田条约》的细则 其中包括在下田划出方圆7日里 在箱馆划出方圆5日里的驻日使馆人员的散步区域 问题。6月28日 培里率舰队驶离日本。

《日美修好条约》是近代日本被迫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下田、箱馆两口岸的开放，一举突破了以长崎为唯一对外联系港口的锁国旧体制，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了。条约中虽然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 但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已为日后美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埋下了伏笔。培里已达到了迫使日本开放国门的预期目标。所以，当培里回国后，纽约商会特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波士顿商人则赠送他一枚勋章 美国国会也授与他2万美元奖金以资褒奖。培里本人则洋洋得意地展望道：美国人将以各种方式 扩展其统治和实力 直到他们牢牢地控制太平洋诸岛 并使撒克逊族在亚洲东岸繁衍生息。^① 这是后话。

美国炮舰外交的成功，刺激了其他欧洲列强。在 1854~1856 年间，英、俄、荷兰 3 国也援例迫使幕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上述条约并未能使侵略者止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日本没有通商的“开国”。迫使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就成为西方列强扩大在日权益的下一个目标。

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任务落到了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肩上。哈里斯出身于纽约一个陶瓷商家庭，曾长期从事对亚洲各国的贸易活动，后弃商从政，于 1854 年出任美国驻宁波领事，成为一个富有殖民侵略经验的“东方通”。1855 年，当得知美国政府正在物色驻日总领事人选时，他匆忙返回纽约，多方奔走，在美国商界和政界中拉关系找门子，以至求到培里门下，恳请推荐。他如愿以偿了。1856 年 6 月，他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首届驻日总领事。同年 8 月 21 日，哈里斯乘军舰到达下田港，在下田近郊的玉泉寺升起了美国的星条旗。

美国驻日领事馆开张不久，英、法在中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幕府当局闻之惊恐，深怕战祸东移。哈里斯充分利用这一良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幕府老中堀田正睦等人大肆进行战争恫吓。危言耸听地大谈英国将乘打败中国的余威来进攻日本，战争的危險已迫在眉睫，日本说应尽早与奉行和平方针的美国缔结通商条约，待日美缔约，其他列强自然以此为准则，与日本订立条约。这样，以和平谈判方式缔结的日美通商条约将成为日本安全的屏障。在哈里斯的软硬兼施之下，幕府只得同意进行缔约谈判。

1858 年 7 月 29 日，双方最终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及《日美贸易章程》。条约规定，除下田、箱馆外，日本再对美增开神奈川、长崎、兵庫（神户）、新泻 4 港口，神奈川开港六个月后封闭下田港；另辟江户、大阪二市为商埠，各商埠实行自由贸易，日本官员不得干预，外国货币可与日本货币等量交换，并可在交易中通用，输出商品的关税，由日美双方协商议定；美国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

权 等等。

日美通商条约缔结后不久，荷、俄、英、法 4 国又蜂涌而来，在 8 月至 10 月间，又先后迫使日本签订了内容相同的通商条约。因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1858 年），故总称“安政五国条约”。自此，日本彻底结束了闭关锁国状态，完成了开国的历史过程。

日本被迫开国后，日益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在经济上，由于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大量的外国商品如棉布、棉纱、食糖等，潮水般地涌入了日本，而日本的生丝、棉花、大米等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则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致使本来就十分微弱的日本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日本已开始沦为欧美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差额，大搞金银兑换的投机生意。当时日本的金银比价为 1:5，而国际市场上的比价为 1:15，西方侵略者便利用这一差额，用墨西哥的银元套购日本的黄金，牟取暴利，致使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到 1859 年下半年，日本外流的黄金即达 100 万两。结果造成币制混乱，物价暴涨，国民经济陷入混乱之中，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人民生活更加恶化，幕府和各藩的财政也更为困难。

在政治上，欧美列强还利用幕府的软弱无能，不断提出损害日本主权的要求，粗暴地干涉日本内政。1861 年，英国的军舰侵入对马岛，企图建造兵营等永久性设施，只是由于对马岛人民的奋力抵抗，英国的干涉才未得逞。从 1863 年起，英、法借口保护自己的居留地，调集军舰 10 余艘进驻横滨，建立了陆海兵营、弹药库和打靶场，横滨简直成了英法的军港。

总之，开国后的日本，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濒于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边缘。在这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日本人民面临着两种历史性抉择：要么墨守旧制，听任民族灭亡；要么维新变革，实现自立自强。日本人民选择了后者，一场维新运